

戊戌变法史述论稿

蔡乐苏摇张摇勇摇王宪明摇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目摇摇录

序言	刘桂生
第一章 摇思想之源	员
第一节 摇老大帝国面临新问题	员
第二节 摇学派与政治：常州学派和湖湘学派的动向	愿
第三节 摇早期维新之士及其代表作	猿
第四节 摇在华外人有关变法的论议	缘
第二章 摇康有为维新理念的形成	远
第一节 摇早年生活与心路历程	远
第二节 摇《康子内外篇》和《教学通义》	愿
第三节 摇“第一次上书”	猿
第四节 摇“复原孔教”	愿
第三章 摇甲午危机与变法初兴	圆
第一节 摇李鸿章陷入困境	圆
第二节 摇严复在天津突发高论	圆
第三节 摇康梁在京城联名上书	圆
第四节 摇光绪皇帝的苦衷	圆
第五节 摇变法初议	猿
第六节 摇京沪强学会的组织与宣传	猿
第四章 摇《时务报》	猿
第一节 摇《时务报》创办原委	猿

第二节 梁启超作为舆论领袖和维新总汇的《时务报》	源园
第三节 梁启超“汪梁之争”与《时务报》的终结	源园
第五章 梁启超与湖南时务学堂	源园
第一节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的建立	源园
第二节 梁启超执教湖南时务学堂	源园
第三节 梁启超时务学堂时期梁启超的变法思想	源园
第四节 梁启超湖南维新局面的早衰	源园
第六章 梁启超变法高潮(上)	源园
第一节 梁启超1898年春天的变法方案	源园
第二节 梁启超恭亲王奕訢对变法的态度与影响	源园
第三节 梁启超“明定国是”与翁同龢被黜	源园
第四节 梁启超新政诏书频频下	源园
第七章 梁启超变法高潮(下)	源园
第一节 梁启超进书以坚光绪变法之志	源园
第二节 梁启超从鼓动设制度局到急欲开懋勤殿	源园
第三节 梁启超裁冗署、罢顽臣、用新人	源园
第八章 梁启超政变风云	源园
第一节 梁启超袁世凯奉召入京的前前后后	源园
第二节 梁启超伊藤博文来华	源园
第三节 梁启超扑朔迷离的政变过程	源园
第四节 梁启超康、梁脱难与六君子就义	源园
参考文献	源园
后记	源园

序摇摇头

《戊戌变法史述论稿》这部书稿读完之后，颇有“通体一新”之感。当然，不足、不妥、遗漏之处仍有，但从总体上说，面貌确是新的。许多在过去没有触及的领域，这次触及了；没有进入的层次，这次进入了，如维新变法方案的多极导向与新政措施的原委利弊；变法高潮中中央权贵、地方士绅、维新志士三者之间的分化、结合、排斥、利用；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思想的内在理路、境况关联及文化特性；湖南维新事业的多元格局以及梁启超与时务学堂的关系；《时务报》在维新运动中的地位、作用和内部争执；严复在李鸿章、张之洞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由此引发出的严著解读密码；变化莫测的政变历程及人物心理的细微描写等等，这些方面，在充分吸取国内外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调整视角，更新方法，展拓领域，深入内层，在解释上加强了深度和力度，取得了新成就，此书无疑是自有戊戌维新变法史研究以来一部承先启后之作。

我对书稿的作者比较熟悉。他们的研究工作之所以取得这样的进展，究其原因，我看可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即：“踏上旧途，跨入新境”。现在有这样一种风气，做学问单讲一些口耳相传的所谓“新理论”、“新方法”、“新途径”，无视甚至鄙弃所谓“旧途”——不过是他们自以为“旧”的“旧途”。须知，古今中外，凡学者，都有一些行之有效、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这些规范围绕着一个中心，可用这样八个字来概括，即：“认清基原，看清前沿”。这里需稍作解释：“基”，指的是“基础”——史料基础；“原”，指的是“原理”——理论原理。下一句说的“前沿”，不需多作解释，基本上指研究现状、突破方向（即 ~~遭逢时局~~、前瞻预测等等。但问

题是怎样才能保证你把这些看清楚,从较具体的地方说,从工具书的使用到“网上功夫”的掌握,都是“要着”。但你对这些不能单纯从运用的角度,从较浅的文化层次上去理解,而必须用历史的眼光,从较深的文化内涵中去把握。种种学术规范所起的作用,就是帮助你在较深文化层次上认识各种操作措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保障史学工作沿着一条平坦而笔直的道路前进。对治史,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说过这样一句话:“从目录学着手”。陈援庵先生常常把这句话作为自己讲课的开场白,数十年如一日。陈寅恪先生也以“预流”二字教导学生。先生所说的“预”,指的是“干预”或“参预”;所说的“流”,指的是“时代潮流”。把这两个字合起来,意思是说:史学本身有着盱衡世局、知人论世的作用,因此,治史者本身也要在学术上跟上时代步伐。先生这样解释道: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喻者也。(《陈垣 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四卷~~四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这些教诲是“句句珠玑”。从上引王鸣盛的话,到二位陈先生的治史经验谈,再到今天一句常说的“网上功夫”,这几者之间贯串一条中心线——信息当先,只不过时代不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然而它们在深层文化内涵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对于治学规范和研究方法这一类东西,绝不能把它们硬分成什么“新”和“旧”。试问,你能把它砍成几段或切成几份,判定哪段为“新”,哪份是“旧”吗?文化这东西,始终是在演化与互动之中形成、存在和发展的。任何外来文化都只有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之上,才能被吸收并对它作出相应解释。古今中外的文化,无时不在交融互释之中,这就是它的常态。因此,“中”中有“西”,“今”中有

“古”，“新”中有“旧”，这才是“常规”和“常态”，这才是文化发展的“正轨”。在这种情况下，硬分什么“新”和“旧”，“东”与“西”，是颇有些“无知妄动”的味道。如今天有人把这种硬分“新”“旧”的老传统继承下来，决心不走治史的“旧途”，实际上他们与之告别的，不是别的，而是那些“旧”中所包含着的“常”，即治史的“常规”。如果撇开这些东西不要，而一味从外面去找什么“新”理论、“新”方法，那么，自己在立足点上先就矮人一头。因为你心中本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有血有肉的历史问题，不可能在思索或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选取方法，在应用方法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原有知识结构和观念体系上的缺陷和不足，从而在应用过程中得到相应提高，反而使“方法”与“问题”分了家，不以本人意志为转移地落入“空谈”之中，那么，结果必然是“欲上新路而未离境”，写出来的文章，面貌上似“新”，骨子里却依“旧”。

以上说明，在我们看来，目前有些人说的治史“旧途”，其实并不旧，只是他们不认识“旧”中之“常”和常中之“新”——常新之“新”，依循着这“常”，便能走上治史的“坦途”。迈上“坦途”的第一步，我看还是那句老话：充分掌握信息，然后在第一手史料——特别是新发现的第一手史料上下功夫。根据未曾使用过的新史料，去检视那些看似已经定型的所谓历史“结论”，抓住若干端倪初现的可疑之点，本着“似疑之迹，不可不查”的治史“要诀”，比较查考，反复探索，力求寻出新解释、新说明、新答案。这样步步为营地做下去，看似走老路，实际上却渐渐跨入新境。因为随着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你的知识结构和观念体系方面都已渐渐得到更新。这样，你种的那块学术园地里就会慢慢长出一棵一棵有生命力的新芽。就我所知，眼前这本《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的作者，就是本着这种态度，按照走“旧路”的方法去从事戊戌维新变法史研究工作的。他们首先在史料上下了一番功夫，编出一部二百多万字的《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将新近出版和以前出版的中、外、新、

旧四类史料,逐日排列,成一巨册。他们特别注重利用国内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近人文集、日记、书信以及海关文档,旁及台湾影印的《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以及海内外学人如汤志钧、杨天石、孔祥吉等几位先生从日本、美国等地发现并引进的新史料。根据这些新史料指导硕士研究生撰写论文,同时又将自己的研究所得撰成论文,先后发表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等刊物上。最近,他们又在这基础之上,以半年之功,集三人之力,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新著。多年来,他们天天走“老路”,我看却天天入“新境”。他们是我往日的学生,今日的同事,自然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高兴。因此,在新书即将出版之际,写几句话作为序,也是我不容推辞的事吧!

刘桂生

1982年 猿月于清华园

第一章 思想之源

发生于 19 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 ,从理论上是对 19 世纪末以来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成果的总结、继承和发展。了解 19 世纪末以来与变法思想有关的一些情况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和认识维新变法运动。

第一节 摇摇老大帝国面临新问题

一时代有一时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1644 年 ,当新兴的爱新觉罗王朝入关时 ,它代表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政权 ,八旗劲旅所向披靡 ,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康熙皇帝继位后以极大的努力先后平定“三藩之乱” ,统一台湾 ,又粉碎了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分裂企图 ,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大业 ,为我国辽阔的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国平定后 ,康熙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 ,其后继者雍正皇帝又实行“摊丁入亩”政策 ,取消人丁税 ,使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经过一百多年 ,到 18 世纪中叶 ,即从顺治皇帝 ,中经康熙、雍正皇帝 ,到乾隆皇帝年间 ,经济日趋繁荣 ,社会日趋稳定 ,国家的收入和储备不断增长 ,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 ,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受人瞩目的强大而文明的国家。

应该说 ,清朝前期在解决国家统一和恢复发展经济方面确实有突出的表现。但对于强盛中所出现的新问题 ,清朝统治者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这些“新”问题主要包括两个 ,一是内部迅速膨胀的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二是外部世界统一市场的初步形成及其对中国的压力。这两大问题成为 19 世纪末以来关系中华民族命

运的关键问题。

首先是人口问题。从有正式人口统计的两汉开始,直到明朝末年,中国的人口一直在 4000 万至 5000 万之间徘徊,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9 年),全国人口达 5959 万,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 56 年)锐降至 4296 万,桓帝永寿三年(公元 173 年)复升至 5467 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因战乱等原因,人口曾有过大幅度下降,到隋、唐、宋时,始恢复到汉代的水平,至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始超过汉代人口统计,总人口数达到了 6853 万,明代中期人口进一步有所增长,达到了 7400 万(1578 年)。^①据人口史专家研究,上述人口数字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比实际的人口数字要少得多,但大体尚可反映历代人口的变动趋势。清代初期,由于战乱等因素的影响,人口统计数字曾一度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由于社会秩序的恢复,特别是由于“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等赋税政策的实施,使这种趋势很快就得以改变,出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据《清鉴》记载,康熙末年人口 1 亿 5000 万,乾隆末年人口达 1 亿 9000 余万,“人口增殖,较之康熙末年,殆多至十倍以上”。^②实际的数字虽未必如此悬殊,如孙毓棠先生等估计清初人口(1644 年)达 1 亿 5000 万,1709 年(康熙六十年)达 1 亿 8000 万,^③但增长的幅度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乾隆以后,这种强劲的增长势头仍然不减。嘉庆八年(1803 年)全国人口总数突破了 2 亿,20 年后,即道光十四年(1839 年),全国人口已突破 3 亿,达到 3 亿 4000 万^④

人口的大幅增长一方面说明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适合了时代

① 摇详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 1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② 摇印鸾章:《清鉴》下册,154 页,北京,中国书店,1982 年。

③④ 摇见孙毓棠、张寄谦:《清代垦田与丁口的记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的需要,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保证了社会的繁荣稳定,为人民生活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但另一方面却又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尽管国外高产农作物新品种如美洲玉米、红薯等的引进和大规模推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压力^①,但清朝统治者对此仍十分烦恼。乾隆皇帝常常感叹:“民愈庶,富愈难”,“国家承平,百有余年,人生不见兵革。每岁户口孳息,千古罕俦。民间谷价,有增而无减,实由于此。朕焦劳宵旰,每怀尧、舜犹病之忧”。^②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他作《民数谷数》诗,诗中说:

民数谷数国之本,每岁各省令具奏。
因命司农计损益,观之持盈惧益懋。
谷数较于初践阡,增才十分一倍就。
民数增乃二十倍,固幸太平滋生富。
以二十倍食一倍,谷价踊贵理非谬。
谷贵因之诸物贵,何怪近利居奇售。
淳朴拟欲禁奢费,游手谋食恐难付。^③
设曰驱之尽务农,那得许田供耕耨?
水旱赈济数逾万,无过补置其罅漏。
三免正供两免费,未见闾阎生计茂。
长此安穷不敢言,蒿目怵心呼天佑。

① 关于美洲农作物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参见全汉升:《美洲发现对于中国农业的影响》,收入《中国经济史研究》下册,1979~1980页,台湾,稻乡出版社,1985年11月。

② 《清实录》卷五九九(乾隆朝),乾隆二十四年十月戊戌条,第597册,12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③ 此处乾隆皇帝自注:“昨岁大理寺少卿刘天成奏请风俗崇俭还淳一折,余心是其言,而行之实有所难。盖太平日久,由俭入奢,不期而然,骤加禁令,罹法者多,且游手谋食之人,转失生计,非善策也。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九十三。”

缓丰或尚可支持,惕息中丰又难邁。^①

人口膨胀带来的巨大压力不仅消解了经济发展的成果,使大多数人生活于贫困状态之中,而朝廷遵循传统的轻徭薄赋的信条和信守自己所颁布的“永不加赋”的诺言,国家财政收入不能增加,不仅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建设,而且连政府官员的薪水也只能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致使收受贿赂成为官员补贴生活的主要手段之一,低级官员要得到升迁,就拼命通过行贿等手段巴结、讨好上司,而一旦得到任命后,又加倍从下属和民间搜刮,形成恶性循环,使得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民不聊生。

相比之下,欧洲国家在同期也遇到了人口快速增长的问题,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增加了生产数量,缓解了人口压力,同时,欧洲各国采取措施,大规模向国外,特别是美洲等地区移民。据统计,18世纪40年代,有150万人离开欧洲,而到18世纪70年代,约有100万人移居国外,1840—1850年间,欧洲向外移民多达1000万。据统计,1800—1850年间,欧洲共向美洲、亚洲等地移民达1000万人。^②大量的移民占领或分布到了相当于几个欧洲的土地上,使得欧洲本土的人口压力得到消解。

清王朝建立以后所面临的第二大问题是世界的一体化及其所带来的机遇和问题。继15世纪末西班牙水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16世纪初葡萄牙水手麦哲伦成功地到达亚洲并完成环球航行之后,17—18世纪,欧洲国家荷兰、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相继加入了扩张的行列之中,陆续占领或控制了非洲、美洲、亚洲大部分地区。正是在这一时期里,欧洲人从中世纪的愚昧落后中摆脱

① 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九十三。

② 参见 英国学者 原桑德斯:《世界人口》,1976年,牛津出版社,1976年;宰扬和 拜扬沃伊廷斯基:《世界人口和生产》,1976年,纽约,1976年。

出来,逐渐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他们的扩张活动对整个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是人们的眼界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地理知识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或某一大陆,尽管内陆地区腹地的情况还不太明了,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海岸线已经为人们所了解,全球性的经济贸易关系逐步建立并发展起来,第一次国际分工完成,南、北美洲和东欧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品,而西欧则指挥这些全球性的经济活动。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股悄然崛起的势力一开始目标就盯着中国。哥伦布首次出航时,西班牙国王给他的使命就是寻找到达中国的路径并与中国建立联系,他之所以把在美洲发现的土著居民称作“印第安人”,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已经到达了中国的印度。此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派出的探险队亦多以中国为目标。西欧主要国家的船只均已抵达中国,与中国沿海地区进行贸易,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还分别于1553年、1573年和1577年先后占领了台湾和澳门,英国的舰队也在广东等地沿海与中国守军发生过冲突。

1644年清朝建立后,武力强盛,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一般说来,国家比较强盛之时,统治者趋向于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清朝入关之初,由于统一的任务尚未完成,南明政府在东南沿海一带坚持抗清斗争,西方势力又频频在沿海地区出没,迫使清政府采取海禁政策。而在1684年收复台湾、国家内部统一基本完成以后,清廷采取了一定的开放措施,下令允许商民造船出海,进行国际贸易,开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对外贸易港口,设立海关,办理对外贸易并监督外商,同时加强对留驻澳门的葡萄牙商人的管理,逐渐恢复或新建立了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瑞典、丹麦、意大利、普鲁士、奥地利、秘鲁、墨西哥、智利、汉堡、不来梅等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海上贸易。陆上则大大恢复和扩展了明

代收缩的贸易，与中亚的哈萨克、浩罕、布鲁特、布哈拉等汗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并一度试图打通经由中亚到达欧洲的陆路贸易通道，但由于英、俄等国在中亚地区的殖民扩张活动而未能成功。

清政府在允许与西方国家开展贸易活动的时候，其着眼点主要不在贸易活动本身。换言之，清朝统治者并不认为国家间的贸易活动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会有多大的积极意义，之所以要允许这种贸易，是因为它可以向四方“夷狄”小国宣示国威。乾隆皇帝于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时托马嘎尔尼转给英国女王的信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上述思想：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贡赍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令大臣带领使臣等瞻觐，赐之筵宴，赉予骍蕃，业已颁给敕谕，赐尔国王文琦珍玩，用示怀柔。昨据尔使臣以尔国贸易之事，稟请大臣等转奏，皆系更张定制，不便准行。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悉于澳门互市，历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即在广东贸易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俱纷纷效尤，以难行之事，妄行干渎，岂能曲徇所请。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恐尔使臣等回国后，稟达未能明晰，复将所请各条缮敕逐一晓谕，想能领悉。

据尔使臣称，尔国货船将来或到浙江宁波、珠山及天津、广东地方收泊交易一节。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

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所有尔使臣恳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又据尔使臣称,尔国买卖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贮货物发卖,……更断不可行。京城为万方拱极之区,体制森然,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尔国向在澳门交易,亦因澳门与海口较近,且系西洋各国聚会之处,往来便益。若于京城设行发货,尔国在京城西北地方,相距辽远,运送货物亦甚不便。……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挽杂。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以上所谕各条,原因尔使臣之妄说,尔国王或未能深悉天朝体制,并非有意妄干。朕于入贡诸邦诚心向化者,无不加之体恤,用示怀柔。如有恳求之事,若于体制无妨,无不曲从所请。况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嘉,倍于他国。今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代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兹再明白晓谕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经此次详谕后,尔国王或误听尔臣下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该处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当立时驱逐出洋,未免尔国夷商徒劳往返。勿谓言之不豫也。^①

乾隆皇帝信中所表现出的天朝大国不可一世的傲气说明清朝统治者对正在迅速发展的近代国际贸易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毫无感受,而只是把这种近代世界的重要活动当成天朝上国对“夷狄”小邦的恩赐。值得指出的是,这并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想法,而是统治阶层绝大部分人的想法。有的高级

^① 转引自秦国经:《从清宫档案看英使马嘎尔尼访华历史事实》,张芝联主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图略~图题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332

官员提出，“汉夷交易，系属天朝丕冒海隅，以中原之货殖，拯彼国之人民，非利其区区赋税也”^①，建议对不听约束的外国商人严加控制，否则就“闭关不纳”，断绝其贸易。

古老的大国在迅速一体化的世界面前遇到了新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关键点，统治阶级中的所有阶层、所有派系都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变法维新活动也首先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

第二节 摇学派与政治：常州学派和湖湘学派的动向

摇摇清中期严峻的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促使士大夫阶层去进行严肃的思考，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北学派（直隶）、桐城学派、扬州学派、浙东学派、岭南学派等均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而常州学派和湖湘学派崛起尤为神速，对现实的反思亦较其他各家更为深刻，所得成果对晚清政治影响尤大，下面即主要对常州和湖湘两学派的发展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常州学派：常州古名延陵，秦置县，西晋以后，历代设郡、州、路、府治，城名先后更迭为毗陵、毗坛、晋陵、兰陵、常州等。从清代雍正年间开始，常州府下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匱、宜兴、荆溪、江阴、靖江等县。乾隆后期，常州籍官员庄存与研读、授徒、著书立说，自成一派，史称常州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除创始人庄存与之外，还有庄述祖、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等。

^① 《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分册，181页，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0。

庄存与(1674—1755)江苏武进人,乾隆十年(1745年)中一甲二名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猿年以后,从翰林院散馆时,因书法不佳,考列二等之末,被停编修之职。又猿年以后,再授编修之职。此后,他先后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及湖北、直隶、山东、河南学政等职。充天文算法总裁及乐部大臣,值上书房、南书房近源年。1755年(乾隆二十三年),庄存与主持满洲、蒙古童生考试,因要求严格,应试童生无法作弊而大闹考场,经御史汤世昌参劾,庄被革职。乾隆皇帝随即亲自主持复试,查出考试夹带、信鸽传递等多种作弊情形,且作弊者正是带头哄闹考场之人,遂撤消对庄存与的处分,庄得以官复原职。^①

庄存与出仕的时代正是清朝由盛变衰的转折时期,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的矛盾相继出现或加剧。18世纪苑园年代中,和珅从侍卫迅速提升为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各种矛盾更趋激化,庄存与本人“在乾隆末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②不仅庄存与本人政见与和珅不合,其侄子庄述祖和女婿刘召杨也受到影响,先后于苑园年代初退出官场,转向对“春秋公羊学”的研究。^③《春秋》据传为春秋末年孔丘所删定,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传”,即《公羊传》、《谷梁传》和《左氏传》。三传中,《左传》成书较早,使用的是“古文”,注重以史实解经,《公羊》与《谷梁》成书较晚,使用的是“今文”,重在阐发《春秋》中所蕴藏的微言大义,《公羊传》尤其如此。

① 《清史列传》第远册,1697—17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② 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魏源集》,上册,1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③ 参见[美]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159—16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关于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原因,详见刘桂生:《清初公羊学复兴原因探究》,载《庆祝周一良先生八十诞辰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